

增订 唐两 京城 坊考

[清] 徐 松 撰
李健超 增订

三 秦 出 版 社

陕西省优秀科学文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96

42.07

3
2

增订唐两京城坊考

[清]徐 松 撰

李健超 增订

三 秦 出 版 社



C

341639

增订唐两京城坊考

[清] 徐 松 撰

李健超 增订

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唐坊街俭家巷小区副3号楼)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青山彩印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 开本 16 印张 380 千字

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7-80546-874-5/K·239

定价:20.00 元

唐两京城坊考序

古之为学者，左图右史，图必与史相因也。余嗜读《旧唐书》及唐人小说，每于言宫苑曲折，里巷歧错，取《长安志》证之，往往得其舛误，而东都盖阙如也。己巳之岁，奉诏纂辑唐文，于《永东大典》中得《河南志图》，证以《玉海》所引、《禁扁》所载，灼是次道旧帙，其源亦出于韦述《两京记》而加详焉。亟为摹钞，爰同球壁。校书之暇，采集金石传记，合以程大昌、李好文之《长安图》，作《唐两京城坊考》，以为吟咏唐贤篇什之助。昔宋皇祐中欲行入阁仪，而莫知故实，后仁宗得《唐长安图》，其仪始定。元丰时，都官员外郎蒙安国得《唐都省图》，献于朝，遂迁旧七寺监如唐制。政和四年，宋昇奏端门桥制，考《唐洛阳图》之四桥。而胡身之注《通鉴》，亦引《阁本太极宫图》、《阁本大明宫图》。是唐宫省之图在宋时已珍重如斯，况于今又数百年后哉。嘉庆苍龙上章敦牂孟夏之月，北平徐松书于文颖馆直庐。

唐两京城坊考校补记

彭程鸿诏伯教

宋皇祐时，欲行入阁仪，莫知故实，仁宗得《唐长安图》，仅始定。元丰时，都官员外郎蒙安国得《唐都省图》，献于朝，遂迁旧七寺监如唐制。政和时，宋昇奏端门桥制，考《唐洛阳图》之四桥。而胡身之注《通鉴》亦引《阁本太极宫图》、《阁本大明宫图》。唐宫省图之珍重，在宋时已如此。大兴徐星伯太守松，读《旧唐书》及唐小说，于宫苑曲折，里巷歧错，以《长安志》证之，得其舛误。而东都则于《永乐大典》中得《河南志图》，证以《玉海》所引，《禁扁》所载，知是次道旧本，其源亦出于韦述《两京记》而加详。亟为摹钞，采金石传记，合以程大昌、李好文之《长安图》，作《两京城坊考》，时嘉庆庚午岁也。道光戊申，平定张石洲大令穆刊之灵石杨氏《连筠簃丛书》中。予得而读之，爱同球璧。庚戌自鸡泽南归，舟中暇，有校补次而记之，以贻好古者。

《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序

徐松是清代的著名学者。他倾注四十年精力撰著的《唐两京城坊考》一书，是继唐代韦述《两京新记》；宋代宋敏求《长安志》《河南志》之后，对隋唐长安、洛阳的城市規制、宫殿官署、街市坊里、苑囿渠道、水陆交通、风土人物等记述最为详备的划时代巨著，一向受到中外学者的称赞，被誉为“集大成”之作。

《唐两京城坊考》一书撰写于1810年。书成后，张穆有校补。1848年刊于灵石杨氏连筠簃丛书中。1850年又有程鸿诏的《唐两京城坊考校补记》。无论是张穆或程鸿诏，对唐两京城坊内容的补充都是极其有限的。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发展，新资料不断涌现，这些都是前人不曾看到的。因此他们对唐两京城坊的研究和复原，自然有许多需要订正和补充之处。《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就是健超基于这样的目的，依照原著的体例和顺序，给予订正和补充。

一、《增订唐两京城坊考》的资料来源

隋唐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又是这个鼎盛时期历史大舞台的中心。许多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和文化等活动最主要的场面，就是在这里一幕一幕地演出的。如果把这两个城市每个坊里中名人宅第、店铺行业、寺庙道观等等都绘制在地图上，那么人们对隋唐时代两京城的历史认识，就会有身临其境之感。徐松通过《唐两京城坊考》一书，力图重现唐

两京城市风貌，藉“以为吟咏唐贤篇什之助”。徐松所依据的资料据说是《旧唐书》及唐人小说、《长安志》《河南志》，还有金石传记等。实际上他征引的出土金石资料并不多，多数是利用编纂《全唐文》的机会，节录其中的碑文、墓志。显然，依靠当时传世的文献资料来勾画两京风貌是很不够的。比如在《唐两京城坊考》中，有些繁荣喧闹的坊里几乎是空白，为了补充这些空白，使两京的坊里内容更加充实，有必要打开近在咫尺的一个尚未被人发现的宝库，这个宝库就在西安和洛阳的郊区，那里有淹埋千年的石刻史书——隋唐墓志。

清末以还，洛阳邙山一带出土历代墓志约六七千件之多。仅张钫先生从1931年夏开始收集的《千唐志斋藏志》就有唐志一千二百多件。其他唐志分藏于洛阳古代艺术馆、开封市博物馆、西安碑林及各收藏家之手^①，另有少数流散海外。与此同时，西安附近也有许多隋唐墓志相继出土。《续修陕西通志稿》金石部分叙述这些出土的墓志时指出：三辅为金石渊数，远征各家之著录，近取士林之藏弃，旁求贩夫贾客，而穷搜于古刹荒坟，煌煌乎巨观也。其中唐代墓志就收录二百多件，至于沦弃于荒山，沉埋于地后者，更不计其数。

1952年开始，西安和洛阳都是我国重点建设城市。城市建设的迅猛发展，不可避免的要在近郊区发掘清理墓葬。粗略统计，西安发掘的隋唐墓有两千多座，数量居全国第一，其中有墓志的达二百多座。洛阳发掘的三百多座隋唐墓主要集中在唐城南郊（今关林一带）^②。西安和洛阳在二十世纪前后出土这数千件隋唐墓志，包括社会的各阶层。有皇子王孙、公主驸马、宫女宦官，宰相将军、达官小吏、文人学士、和尚道士、御医画家、俳优歌妓、城市平民、少数民族、外国侨民、西域商贾等等。墓志上记载着他们的生平事迹，这对研究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也从不同的角度为重现唐两京的城市风

貌提供了翔实的根据。这就是《增订唐两京城坊考》的主要资料来源。

徐松在《唐两京城坊考》一书中的序中说：“余嗜读《旧唐书》及唐人小说，每于言宫苑曲折，里巷歧错，取《长安志》证之，往往得其舛误。”存世唐籍浩如烟海，以徐松一人之力，难免有所遗漏。就在他常读的《旧唐书》中也有不少珍贵的史料被遗漏了。如《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开元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夜暴雨，东都谷、洛溢，入西上阳宫，宫人死者十七八。……京城兴道坊一夜陷为池，一坊五百家俱失。”徐松在《唐两京城坊考》卷二、西京兴道坊下虽征引《朝野僉载》略同于五行志的记述，但他却说：“按事不见他书，未可信”。如果他留意到《旧唐书》的这条记述，大概是不会出现上述按语的。又如“贞元二年夏，京师通衢水深数尺，吏部侍郎崔纵，自崇义里西门为水漂浮行数十步，街铺卒救之获免。其日溺死者甚众”。这些均出自《旧唐书》，而非僻书琐记，而徐松也未述及。漕渠是东都经济繁荣的生命线，东南财富多靠它输送洛阳，维护它的畅通关系到国计民生，甚之关系到王朝的安危，理应有较为详备的记述。但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却寥寥数句。《旧唐书·五行志》载开元十四年“七月十四日，瀛水暴涨，流入洛渭，漂没诸州租船数百艘，溺死者甚众。漂失扬、寿、光、和、庐、杭、瀛、棣租米一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六石，并钱绢杂物等。因开斗门决堰，引水南入洛，漕水燥竭，以搜漉官物，十收四五焉”。“十八年六月乙丑，东都瀍水暴涨，漂损扬、楚、淄、德等州租船，壬午，东都洛水泛涨，坏天津、水济二桥及漕渠斗门，漂损提象门外助铺及杖舍，又损居人庐舍千余家”。这些记述生动地反映出东都的自然环境和城市风貌。此外，如洛阳城内的都亭驿，在全国交通系统中地位非常重要，屡见于载籍。《旧唐书》卷一五四《吕元膺传》记载李师道以东都留邸伏甲谋乱“留守防御将二人，都亭驿卒五人，甘水驿卒

三人，皆潜受其职署，而为之耳目。”（又见李师道传，裴炎传以及《新唐书》王同皎传等）。关于柳宗元在长安的宅第，据《柳宗元文集》卷十三《下殇女子墓誌记》“下殇女子，生长安善和里，其始名和娘。”又《寄许京兆孟客书》本集卷三十“家有赐书三千卷，尚在善和里旧宅”。柳宗元是唐代著名文人，其文集也非僻书琐记，惜徐松也未能搜集。这些散见于唐人文集和唐史中的点滴记载，也是《增订唐两京城坊考》的另一资料来源。此外，隋唐长安与洛阳考古出土的文物，野外考察收集的隋唐墓志、经幢、碑石等资料也一并收入增订之中。

二、校正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之误

《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不仅补的内容在数量上几与《唐两京城坊考》相埒，而且订正了后者的一些谬误。

关于西京一百零八坊的名称，《长安志》的宋刻本早已部分佚失，现存明成化、嘉靖两刻本中，朱雀门街西从北第一、第二坊缺名。徐松在《唐两京城坊考》卷四中定第一坊为光禄坊，第二坊拟定为殖业坊。他写到“《长安志》于此缺二坊，别无善本可证。李济翁《资暇集》永乐坊古冢下注云：‘光禄坊内亦有古冢。《新记》不载，时之以与永乐者对，遂目为王母台。张郎中谿云，常于杂钞中见光禄者，是汉朝王陵母墓，以贤呼为王母，所以东呼为王公’。按光禄坊之名，不见《长安志》。既云与永乐相对，又云东呼为王公，是在永乐之西，恐两坊内有一名光禄者，今注于第一坊下，以俟考。”关于第二坊，他说：“或此缺坊为殖业欤？”徐松对这两坊名称，采取了慎审的态度。但此后，所有唐长安图上，《长安志》所空的这两坊，分别填上了“光禄坊”和“殖业坊”（或殖业坊仍空）。实际上唐长安城是不存在光禄坊和殖业坊的。这两坊的名称，从北第一是善和坊，第二是通化坊。不是徐

松所说的“别无善本可证”，而是徐松在当时没有看到善本。这个善本就是元路天驷的《类编长安志》。路天驷长安人，该书历明清两代至今六百多年，迄未重刻重印，元刊久绝，传钞也极为罕见。在《类编长安志》中，这两坊就明确记载善和和通化。关于《类编长安志》的史料价值，黄永年先生已有论著^③。此不赘述。但需要补充说明一点，自徐松逝世一百多年来，西安附近或其他地方出土的隋唐墓志没有一件光禄坊的；但确有不少善和坊。同样，也没有出土一件殖业坊的，但确有几件通化坊的。

关于东都，隋初营建时规划为一百零三坊和三个市。《唐六典》卷七，都城“郭郭南广北狭，凡一百三坊，三市居其中焉。”《旧唐书·地理志》“都内纵横各十街，分一百三坊。”这些文献记载也为考古探定的街道和沿用下来的旧路所证实^④。东都洛阳城被纵横各十条街道切割成一百零七个方块，每个方块为一坊，南市占四块，北市和西市各占两块和一块，其余一百块为一百坊，这与《唐六典》和《旧唐书·地理志》所记并不相符。

东都“一百零三坊”是隋初规划时的情况？但起初也未必完全恪守此规。例如在这“一百零三坊”之外，西南隅外有富义等坊，富义坊曾有南朝陈后主叔宝的住宅，唐初改名为广利坊，开元时并入苑内。随着洛阳政治地位与经济形势的变化，坊里的数量时有增减，或废或徙，有的一分为二，也有的坊名常有变更。所以，在不同的时期，坊名有更改，坊数有增损，这是正常的。但徐松所统计的一百一十三坊就有明显的错误和遗漏。主要有四，一误添时泰坊；二遗漏乐城坊；三错改行修坊和兴敬坊；四，南市和通利坊的面积和地点有误。

《唐两京城坊考》卷五，安喜门东街，从南第一坊曰时泰坊，向北依次为时邕坊、立行坊、殖业坊、丰财坊共五坊。而同书《东都外郭城图》中却无时泰坊。原来时泰是宋代洛阳的坊名，徐松依照《元河南志》误加的。《元河南志》“东城之东第四街南北

街北当安喜门东街凡五坊”其下注文“按五坊之内，比唐多时秦一坊”。这已明明说出唐代无此坊。另外尚有两点证据，其一，按徐松所记时秦坊的地理位置，漕渠是必经之地，但以徐松所记载唐时漕渠的流路并无时秦坊。第二，洛阳附近和其他地方出土的数千件墓志，没有一件是唐代时秦坊的。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及其《东都外郭城图》中均无乐城坊之名。实际上东京乐城坊不仅有历史文献可证，而且还有许多实物证明。《元河南志》卷一，唐之南市下注文“隋口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唐贞观九年，促半坊，其下通利坊，居半坊。今不分市，通利直接嘉善，疑以次皆促徙近南，所以容增安远一坊”。又在安远条下注“续添此坊，即唐乐城坊之地”。由此可知安远坊所在之地，就是唐代的乐城坊。《元河南志》中之“今”指宋或元而言，宋代通利坊之北就是唐代的乐城坊。近十几年来，洛阳出土的唐人墓志，有近二十件墓志的主人生前皆居住在乐城坊，（见《增订唐两京城坊考》正文）。时间上看，从显庆四年（659）至大中四年（850），也即从唐高宗到唐宣宗这二百多年间，都有人居住在乐城坊。当然这并不是说显庆以前和大中以后就没有人在此坊居住了，只不过至今尚未发现这类墓志而已。

乐城坊的地理位置既然在通利坊之北，而唐代的通利坊又占南市之北半坊，即上述引文所说。南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唐贞观九年，促半坊，其下通利坊，居半坊”。换言之，唐贞观九年之后，南市和通利坊共占两坊之地。然而，迄今为止，所有东都洛阳坊里复原图上的南市均占两坊之地，而南市之下的通利坊也占一坊之地，共占三坊之地。显然这是不符合历史记载的。如果图上将南市的范围划为二坊，则成为贞观九年以前之制（实际南市占四坊）。其时无通利坊之设置，如果图上有通利坊之制，则南市只应有一坊半之地，其北半坊即为通利坊，至今为止所有洛阳坊里复原图上通利坊所占的位置实际上就是乐城坊的地域。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定鼎门街东第二街从南第三曰“修行坊”下刘轲宅“刘轲陈玄奘塔铭，岁丁巳，开成纪年之明年，有具寿沙门曰令俭，自上京抵洛师，以缥囊盛三藏遗文传记，访余于行修里”。徐松注“行修即修行之讹”。因此，《唐两京城坊考》把定鼎门街东第二街从南第三坊定为“修行坊”。但是刘轲所撰《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并序》无论是《全唐文》或《刘希仁文集》（《岭南丛书》本）均为行修里。徐松改行修为修行对不对呢？

《千唐志斋藏志》中有五件关于行修与修行坊的墓志。其中三件墓主人均卒于东都行修坊：一为大节之女龙朔三年六月一日终于东都行修里；二为京兆韦頊夫人张氏大中二年十月十四日，终于东都行修里之私第；三为唐剑南东川节度副使支昝妻郑氏辛卯年二月六日捐生世于行修之里第（此志未言明东都）。二件墓志的墓主人卒于长安修行里。一是唐试大理评事郑易夫人范阳卢氏于壬申岁十一月四日，终于长安之修行里；二是唐故郑氏嫡长于元和十一年三月十四日殇于修行里，其年四月权葬于万年县宁安乡义善寺西，又以其年八月二十七日归附河南县梓泽乡续村先莹。不言而喻，万年县宁安乡在今西安市郊区，河南县梓泽乡即今洛阳市北郊，嫡长殇卒于长安修行里，先权葬万年县，后归葬河南县，所以这个修行里决不是东都的。以上五件墓志说明，东都有行修里而没有修行里，而西京长安有修行里而无行修里，泾渭分明，不容混淆。所以徐松改东都行修里为修行里是错误的。西安出土的修行坊墓志也为数不少。而洛阳古代艺术馆所藏的樊赤松上元元年十二月终于行修里和支纳乾符五年七月终于行修里更是洛阳有行修里的有力证据。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长夏门之东第二街从南第一曰“兴教坊”。该坊之下徐松仅引两项内容：一为秘书少监赵云卿宅，依据《河南志》引《萧颖士集》“兴教里有赵云卿宅”。徐松按

“敬”即教之误”。第二为李师道留后院，依据的资料是《资治通鉴》元和十年八月条，记载的是兴道院，徐松按“兴道即兴教，或原作兴道”。这两条没有一条说明这个坊是兴教坊。那么这个坊究竟是兴教坊还是兴敬坊？抑或是兴道坊呢？《河南志》卷一：“按萧颖士集，兴敬里有秘书少监赵骅宅。骅字云卿，子宗儒相懿宗。而韦述记无兴敬坊，疑后改之。”《河南志》说韦述没记载兴敬里，我们无从得知，但又说“疑后改之”确不是事实。韦述在世之时洛阳已存在着兴敬坊。其一为今藏洛阳古代艺术馆的正议大夫龙州刺史许观，开元七年七月二十二日，终于河南县兴敬里私第。其二是《千唐志斋藏志》中夫人清河张氏开元十二年终于东都兴敬里私第。而韦述卒于至德年间，这大概不是偶然巧合吧！这两条实例再加上《萧颖士集》中所说兴敬里已有三条根据。另外开封市博物馆藏洛阳出土之孙仲墓志：“（开）成元年十月申辰终于中都兴敬里”。唐代中都指的是河中府，不知中都是否为“东都”之误？查洛阳出土墓志，无一为兴教坊的。徐松改兴道为兴教理由也是没有说服力的。他说：“通鉴言贼出长夏门望山而遁，兴教正在长夏门内也。”难道说在长夏门内就该是兴教坊吗？其实，隋唐时代两京确有一兴道坊，但是这个兴道坊是在西京而不在东都。由于兴敬坊僻居在东都城南部，居人寥落，出土的墓志也很少，在尚未取得更多例证的情况下，东都兴教坊应改为兴敬坊为宜。

三、《增订唐两京城坊考》验证 《长安志》、《河南志》的真实性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一书的内容，除利用金石传记及《旧唐书》之外，主要采自《长安志》和《河南志》^⑤，我们指出《唐两京城坊考》上述错误，难免使人怀疑《长安志》和《河南志》所记载的史实是否真实？今举数例说明《长安志》和《河南

志》的内容是可信的，而且由实物证实。

《长安志》卷七唐皇城南面三门，正南曰朱雀门，东曰安上门，西曰含光门。西面二门，南曰顺义门，北曰安福门。1983年西安市修建环城公园时，除安上门和顺义门分别压在今西安城南门和西门之下外，朱雀门、含光门和安福门的遗址均被发现，并对含光门进行了发掘清理工作。这些唐皇城南面和西面城门门洞数和使用情况与《长安志》记载完全相符。

《长安志》卷九：兴宁坊东南隅左卫大将军泉男生宅。泉男生，高丽人，《新唐书》有传“赐第京师”。墓志1921年在洛阳城北东岭头村出土，今藏开封市博物馆。志云：仪凤四年（679）薨于安东府之官舍（今朝鲜平壤，《旧唐书·高丽传》云：仪凤初卒于长安），后葬于洛阳北邙山。泉男生既然死在平壤，葬于洛阳，那么，《长安志》所載在长安兴宁坊宅第又如何解释？洛阳古代艺术馆藏泉男生之曾孙宣德郎骁骑尉泉愍墓志云：泉愍，京兆万年人，曾祖特进卞国襄公男生。开元十七年九月四日，终于京兆府兴宁里之私第，春秋二十二，开元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迁厝于河南府洛阳县之邙山旧茔。泉愍墓志证明《长安志》所載兴宁坊之泉男生宅是可信的。

《长安志》卷九靖恭坊工部尚书杨汝士宅条注文云“与其弟虞卿、汉公、鲁士同居，号‘靖恭杨家，为冠盖盛族’”。杨汝士是牛党党魁杨虞卿之从兄。杨氏是弘农名门大族，从杨虞卿之父杨宁开始，莹域在洛阳北邙山。解放前在洛阳城北先后出土了杨宁、杨虞卿之子、子妇、孙子等五件墓志，均标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长安靖恭坊（见《千唐志斋藏志》），这些墓志的出土，证明“靖恭杨家”，确为“冠盖盛族”。

《长安志》卷九太平坊西南隅温国寺，注文“本隋实际寺，隋太保薛国公长孙宽妻郑氏舍宅所立，景龙元年殇帝为温王，改温国寺，大中六年改崇圣寺”。实际寺曾经是高僧鉴真和尚受具足戒

的一座名寺。据《长安志》所载之方位恰在今西北大学南门之内。1982年西北大学南门内西侧兴建宾馆饭厅时，在地下发现大量寺庙遗物，有贴金石经幢碎片，贴金浮雕佛像、善业泥等。虽然没有文字说明这些文物是实际寺（温国寺）的遗物，但在这里发现寺庙遗物决不是无缘无故的。

《长安志》卷十修德坊西北隅兴福寺，注文“本右领军大将军彭国公王君廓宅，贞观八年太宗为太穆皇后追福，立为弘福寺，神龙中改为兴福寺。……太宗时广召天下名僧居之。沙门玄奘于西域回，居此寺西北禅院翻译。寺内有碑，面文贺兰敏之写金刚经，阴文寺僧怀仁集王羲之写太宗圣教序及高宗述圣记，为时所重。”玄奘在弘福寺翻译佛经，《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述详细。怀仁集王羲之太宗圣教序碑，今藏西安碑林，但已无贺兰敏之写金刚经。弘福寺遗址在哪里？1982年3月中旬，西安电瓶车制造厂修建地下排水管道，于大门外1.5米处地下约1米发现《大唐弘福寺故上座首律师高德颂碑》。首律师俗姓皇甫，朝那人，舍化于贞观九年朱明月，显庆元年十二月十八日立碑，许敬宗撰文，郭广立书。碑已伏，面上，头南，似无移动位置。碑石出土地点在今西安火车西站正北，南距铁路线约30米，按《长安志》所记方位和里程，此地正是长安城修德坊西北隅。

至于《长安志》上所记的某某人某某坊里的宅第，有些不仅有唐代文献资料可资佐证，解放前后，出土的墓志更证明了这一点。

东都洛阳城，据《元河南志》载嘉善坊内有荷泽寺经坊，但未知经坊的具体位置。1968年10月，茹家凹大队第二生产队在村东南取土时，距地表深1米左右挖出石经幢一段，八面形，用梵汉两种文字刻“尊圣佛顶陀罗尼”经文，上款署“三朝国师大兴善寺三藏沙门大广智不空奉诏译”下款为“会昌元年二月十五日弟子张弘谦建立”。经幢出土位置在建春门街南面，长夏门街以东

第二列坊由南向北第四坊内东北角，北距建春门街路约70米，西距西街路约100米，按《元河南志》记载当在嘉善坊内，石经幢无疑是荷泽寺经坊的遗物。

《元河南志》宣风坊有检校文昌左丞、东都留守李峤宅。洛阳古代艺术馆藏有《唐正议大夫使持节相州诸军事相州刺史上柱国赞皇县开国子李公墓志铭并序》志云：公讳畅，字完美，开元十八年六月八日，薨于东都宣风里第，以其年十月朔九日，葬于邙山之阳。李畅，两唐书无传，仅在李峤传中提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赵郡李氏，畅相州刺史，父峤，字巨山，相武后”，李畅墓志的出土，为《元河南志》所载宣风坊李峤宅的存在，提供了证据。

《元河南志》载道光坊“唐有昭成寺”，仅此五字。昭成寺有无？没有佐证。《千唐志斋藏志》945《梁州城固县令渤海封君墓志铭并叙》云：郡讳揆，渤海□人，以贞元二年七月六日终于道光里昭成精舍，这又为道光坊昭成寺的存在提供了证据。

东都洛阳毓德坊，按《元河南志》的记载地点在京城之东第五南北街从南第三。1980年7月在洛阳市老城东花坛之南地下1米发现福州刺史管元惠神道碑，碑文载开元二十六年，来朝京师，夏六月丁未至洛阳，遇疾薨于毓德里第，春秋七十四。管元惠碑文内容近乎墓志，由于某种原因，没有运往墓地，而留在宅内。此碑出土地点，东距唐上东门，北距唐安善门均约1公里，按其地望正是毓德里。与长安城一样某某人在某某坊里的宅第，有许多被解放前后出土的墓志所证实。

四、几个坊里名称的推测与待考的坊里

《增订唐两京城坊考》的史料，不仅充实了唐两京坊里的内容；证明《长安志》和《河南志》的记载是可信的；校正了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一书的错误，也提出了一些过去不曾看到的坊里名

称等新问题，有待于考证。

《千唐志斋藏志》之中有贞元十八年一月与九月的两件墓志，主人分别卒于“三市之里”和“三市之第”。这两件墓志均为乡贡进士赵南华撰。那么“三市之里”是泛称？拟或有指？按唐之三市指南市、北市和西市。诗人韦庄寓居洛阳时有诗：“官官试马游三市，舞女乘舟上九天”之句，所指应是三个市的意思。这两件墓志所称的三市之里，究竟在什么位置，存以待考。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唐韦述《两京新记》及《元河南志》等书中东都均不载弘敬里。但安诞夫人刘氏永徽四年终于弘敬里（《芒洛冢墓遗文》）。王夫人总章三年卒于弘敬里；孙阿贵夫人须摩提大足元年卒于神都弘敬里（以上二志见《千唐志斋藏志》）。如果东都确无弘敬里。那么，这些墓志为什么如此记载呢？如果有，位置应在哪里？《旧唐书·五行志》永淳元年六月十六日，“连日大雨，至二十三日，洛水大涨，漂损河南立德、弘敬，洛阳景行等坊二百余家，坏天津桥及中桥”。五行志中不仅确证东都有弘敬里，而且它与立德和景行并列。但文献资料与立德、景行并列的是归义坊，因此推论归义坊原名弘敬坊，为避讳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之号而改名的，如西京的弘化坊改为崇化坊，东都的弘教坊改为宣教坊就是其例。

洛阳古代艺术馆藏处士金魏墓志云：永徽五年十一月九日终于景仁里。东都无景仁里。《元河南志》卷四《唐城阙古迹》漕渠条：漕渠流经路线是立德坊之南，归义坊、景行坊之东南，又东经时邕、毓财与积德之南。对照《东都外郭城图》和有关记载，则景仁坊即景行坊。

史籍记载东都有徽安门，而无徽安里。徽安门是东都北面西门，西临含嘉仓城。洛阳出土唐墓志有三件是“死于徽安里私第”，“终于东京徽里之私第”“死于河南徽安里之私第”，时间是唐玄宗天宝七载至十一载之间，徽安里很可能在徽安门附近。